

傳播論壇

「向何處去？」、「倚何處立？」與 「以何為本？」：新媒體時代 中華新聞傳播學(刊)的發展前景與格局

徐來、黃煜

摘要

新媒體時代下，中華新聞傳播學的建構、轉型與發展，成為華人傳播學術共同體亟需應對的時代之思。學科的發展與學刊休戚相關，藉《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十週年之際，全球各地華人新聞傳播學刊主編們齊聚香江，共襄盛舉，針對新媒體技術衝擊下的中華新聞傳播學(刊)應「向何處去？」、「倚何處立？」與「以何為本？」的問題各抒己見，秉持中華新聞傳播學(刊)應向著研究內容求「本」、求「實」，信息平台建構求「共」、求「新」，學術人文關懷求「真」、求「深」的發展目標與方向，期待華人傳播研究者立足中華傳播文化、聚焦本土傳播實踐、齊力發展新時代下的中華傳播學門。

關鍵詞：新媒體、傳播學刊、發展前景與格局、中華傳播學門

徐來，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研究興趣：政治傳播學、修辭學。電郵：13822122234@139.com

黃煜，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研究興趣：新聞與媒體表現、傳播政治經濟學。電郵：s03033@hkbu.edu.hk

Where to Go, How to Spread, and What to Root: The Prospect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Lai XU, Yu HUANG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become urgent tasks of all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ecause the growth of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t is a principal issue for the editors of academic journals. To mark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leven editors of maj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came together to discuss ways to develop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journals. Consensus was reached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where to go?” “how to spread?” and “what to root”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editors emphasized embracing new media platforms, and social science–cum–humanistic approach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y also called for encouraging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to pursue their research agendas based on cultural and societal conditions and to focus on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processes, and patterns to develop dynamic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Lai XU (Lecture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hetoric.

Yu HUANG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performanc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The Prospect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Keywords: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journal, development prospect, pattern, Chines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u, L., & Huang, Y. (2017). Where to go, how to spread, and what to root: The prospect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1, 251–275.

致謝

本文撰寫過程中參考《新聞學研究》主編馮建三教授、《中華傳播學刊》主編楊意菁教授、《國際新聞界》主編劉海龍教授特針對本次會議組辦方所列問題¹作出的書面回答，及其他各位與會主編的精彩會議發言，特此鳴謝。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無論是否意識得到、或是願意與否，我們的「地球村」正在日復一日、愈陷愈深地捲入由互聯網編織而成的巨大而複雜的網絡情境中(張國良，2016)。新媒體技術革命風起雲湧，改變的不僅僅是我們的生活，更衝擊著人們的頭腦思維方式(巴里·威爾曼，2016)，成為時代情境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與轉型的重大觀照。對華人新傳研究學術共同體而言，新媒體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無疑是巨大的，在時代浪潮的「東風」下，如何「因勢利導」、促進中華新聞傳播學的發展成為近年來學術共同體探討的焦點議題。

無庸置疑，學科建設、發展與轉型，與學術期刊的作用密切相關——學刊是學科發展的瞭望燈塔，學刊發表的論文代表了一個時期學界的發展方向，亦代表了學術共同體評判的標準；學刊亦是學界的一面明鏡，論文的相關內容反映出學刊所在地區的研究水平與研究取向，研究者的研學旨趣、關注熱點藉助這一信息傳播平台得以呈現；卓越的學術刊物更成為研究潮流的風向標，引領著專業學術研究的趨勢與發展。那麼，如何充分發揮新媒體時代下中華新聞傳播學刊的作用、促進中華傳媒研究的發展、激發卓越成果的產生、為時代的進步貢獻心力？

2016年9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與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藉慶祝共同承辦的國際傳播學會旗下唯一中文學刊——《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十週年之際，舉辦以「華人傳播研究與學術期刊」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誠邀兩岸四地知名傳播學刊主編們齊聚香江，集思廣益、共襄盛舉。

會議由《傳播與社會學刊》發行人、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黃煜教授與《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主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陳韜文教授致辭，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新傳學院羅文輝教授主持，《新聞學研究》主編馮建三教授、《新聞與傳播研究》主編唐緒軍教授、《現代傳播》主編胡智鋒教授、《國際新聞界》主編劉海龍教授、*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主編郝曉鳴教授、*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副主編蘇鑰機教授、《傳播研究與實踐》資深編委林富美教授、《中華傳播學刊》主編楊意菁教授、《新聞大學》主編張濤甫教授、*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執行編輯韋路教授、《傳播與社會學刊》編輯周樹華教授

等在內的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各大中華地區11本最具影響力的中英文中華傳播學刊負責人切磋磨琢，獻言獻計，依據當前中華傳播學(刊)發展的現狀與格局、²機遇與挑戰，以及未來的趨勢與方向，對新媒體時代下中華傳播研究應「向何處去」、「倚何處立」與「以何為本」等問題展開討論。會上所談，雖有關涉學刊發展的操作層面與技術話題，但更多是完全具有普遍學術意義的學門發展問題，值得與學界同仁分享。

「向何處去？」：傳媒研究 求「本」求「實」

「你有沒有思考過中國的案例？那裡有百萬個靈敏的頭腦，卻浪擲在一些虛有其表的技藝上面。他們沒有方向、沒有動力，所以他們努力的結果徒勞無功，全世界都嘲笑中國。」(Sadison, 1967, 轉引自汪琪、沈清松、羅文輝, 2002)

十九世紀到1950年代，從最初歐洲殖民動力驅動下的東方研究熱潮，到二戰國際權力架構劇變下聚焦中國的觀察與思考，東方始終是歐洲自我得以建立的「他者」(Said, 1978)，而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化觀點與角度，亦使得中國被建構為缺乏核心與方向的「蟻蟻眾生」、「散沙一片」。儘管歷經二個多世紀的時光流轉、國家權力的博弈與地域、學門藩籬的突破，中華文化與體制已擺脫嘲諷的目光，轉而成為新觀念的來源(陳光興, 1998)。然而，就當前中華傳播研究及其何去何從的問題，Sadison的論述仍一語成讖：這裡的研究，「中心理論貧乏現象」(劉楓, 2010)有之、「傳播不知研究什麼」有之、「研究形式大於內容」、「實用取向遠甚理論關懷」(陳力丹, 2005)亦有之。舊問題尚存，新挑戰又接踵而至。尤其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媒體浪潮，我們的研究，是應隨「浪奔浪流」、還是固守灘頭、抑或靜觀其變蓄勢待發？需要每一位沉浸其中的學術共同體成員作出判斷與選擇。可以確定的是，「順流而下」或「擊水而上」，要想做到「弄潮兒於潮頭立」，屹立不倒的前提須牢牢把握住手中的舵盤——「舵為船之魂」，那什麼是新聞傳播研究的學術之魂、學刊之魂呢？——內容。可以說，學術與刊物能否經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起時代浪潮一波接一波日劇激烈的挑戰與考驗，其安身立命之本永遠是學刊刊載的研究內容及內容所呈現出的社會責任，一言以蔽之，即我們的研究，內容是否圍繞了(華人)社會傳播事件與文化、理論是否提煉於(華人)社會傳播現象、目標是否旨在為建構以華人社會為研究主體的「中華傳播學」而努力。顯而易見，「中華傳播學」的建構，對於中華傳播研究未來的方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中華傳播學門建構之可能性與重要性

何謂「中華傳播學」?顧名思義，即是把學術研究紮根於中華文化的土壤，在理性接受與批判西方傳播學思想與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創建出一套貼切適用於華人及華人社會傳播行為與溝通方式的本土性研究學門。與自然學科不同，人類的傳播行為雖具普世性，但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使得傳播互動過程中的對象、屬性與功能具備強烈的地域性、本土性特點。這些特點猶如印刻在民族文化活動中的遺傳基因，隨著時代的變遷在人類傳播行為中被複製、轉錄、顯現、表達出來。研究這些刻有民族、地域烙印的傳播行為，大至國家間的國際關係、跨文化交流，小至社會中單一個體的禮尚往來、溝通言談及其背後的規則與規律，皆囊括於「中華傳播學」的研究範疇。「學」的內容肌體背後，需要理論與方法的骨骼支撐，更需要以中華文化為根本的心臟動力。它並非尋求或附和業已存在的普適性人類傳播理論與規律，或是「南橘北枳」地將西方傳播學理論與方法生搬硬套於中華傳播事件的研究，而是有自己的清晰目標與宏願——以中華傳播文化為「立命」、「立心」之本，作「繼絕學」、「開太平」之求，需要每一位華人傳播學者的努力。

無庸置疑，建立「中華傳播學」的學界呼籲已非「新」聞，但在新媒體技術日新月異、地球村呈現文化趨同的今天，我們為何要更為迫切地倡籲建構「中華傳播學」呢?原因有二。

其一在「古」。中國是歷史文明古國，東漢時期便已出現「傳」與「播」的概念。許慎的《說文解字》:「傳」，遽也，即以驛馬或驛車傳遞文件;「播」，「種」也，一曰「佈」也。故而「傳播」二字合起來可理解為

「遠距離地發佈訊息」。據方漢奇教授(1999)進一步考證,「傳播」一詞最早出現於1,400年前的《北史·突厥傳》,「傳播中外,咸使知聞」一說,即為將(信息)廣泛散佈,使天下人盡數知悉。與今義已十分的相近。不僅如此,綿長千年的中國歷史中,還存有大量關於傳播行為與活動的論述,信手拈來,「傳」、「播」、「揚」、「流」、「布」、「宣」、「通」、「遞」、「召」、「表」、「書」、「說」、「談」、「講」、「論」、「頌」、「吟」、「詠」、「唱」等,皆為對不同的傳播行為方式之紛呈;細心領悟,「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達練即文章」、「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等話語論述,更是對中國傳統社會傳播規則與交流藝術的提煉。時代的更迭、事件的頻出、人性的豐富、文化的深厚,使華人傳播行為為研究學者們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寶貴研究素材,它們具有人類傳播行為的普遍共性,更有巍巍東方文化浸染而出的濃厚的本土性特點。將這些頗具文化特色的話語、行為與事件進行本土化、系統化的事件研究與規律提煉,建立獨立、權威的「中華傳播學」充滿了無限希望與可能。

其二則在「今」。「傳播」作為一個研究的概念,進而發展為一門以訊息傳遞與交換為研究核心的學問,是近現代西方社會時代變革推波助瀾的產物。十九世紀西方工業化浪潮下湧現而出的工業化、都市化及教育普及三大潮流,展現出對媒體的需求和對有效溝通的渴求。時代的推動使得「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學科幾經醞釀,呼之欲出,終在1940年代的美國應運而生(陳國明,1999,2001; Delia, 1987)。相比之下,中華新聞傳播研究則起步較晚。儘管1918年國立北京大學首開新聞學研究會,拉開中國新聞學研究的序幕,然而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新聞傳播研究卻始於1950年代的港台地區。很大原因,緣自大陸當時囿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形態,基本與外部學界隔絕,遑論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的發展(陳力丹,2005)。直至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1982年,學者余也魯陪同「傳播學之父」施拉姆(Wilbur Schramm)展開訪華的學術「破冰之旅」,大陸新聞傳播研究方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盛起來(Zhang, 2006)。然而,由於大陸新聞傳播研究擺脫不了「以新聞學掛帥」的指導思想、過度重視新聞研究的實用性取向,使其甫一起步便隱現發展失衡、學界版圖不全的「跛足」徵兆(陳力丹,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2005)，出現大眾傳播研究成為大陸傳媒研究的主體、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公共傳播及其他傳播學著作則「星星寥寥」(張健康，2003)的現象。「跛足」者，偏又「亦步亦趨」，包括港、台及大陸地區在內的中華新聞傳播研究作為學域「後起之秀」，幾乎完全跟著西方的腳步走(Lee, 2005; Leung, Chu, & Lee, 2006; Wang, 2006; Wu, 2006)。這種完全依賴於西方傳播學研究理論與方法路徑的學術「搭便車」現象，或與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動盪不堪，傳統文化紐帶的斷裂，新一代學者對中國文化與固有傳統缺乏深刻認識的原因有關(Chen & Miike, 2005)；但當前新聞傳播教育訓練中思辨與批判能力的有待加強亦是成因。因此，儘管當前華人傳播研究欣欣向榮，但令人遺憾且困窘的是，至今我們依然無法舉出任何一種獨立、權威、受到學界公認的「中華傳播理論」，甚至在「亂花漸慾迷人眼」的時代情境中，對於我們當前的方向應向何處去，尚無一個學界的廣泛認同。

故而當前的華人新聞傳播研究，一方面，一邊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與豐富生動的華人實踐，另一邊卻是浮沉於西方傳播學理論中漂泊無根的華人傳播研究，使得大多中華傳播研究文章呈現為對西方傳播理論與方法的「追趕」與「複製」(張國良，2016)，往往陷入「一假設二數據三發現」的西方新聞傳播學的經典研究量化模式，顯現「不明確顯示立場觀點」的西方式純學術純客觀風格(童兵，2016)，這不啻為「入寶山而空手歸」的極大遺憾；另一方面，「西方傳播學理論不能定於一尊，而且除非經過國際層面的考驗，終究還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論層面」(李金銓，2014)，即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西學東漸」的傳播學理論也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世意義，在研究中國的受眾及效果時，依然存在「隔靴搔癢」之效(祝建華，2008)。更何況西方傳播學經典理論出現幾十年，耳熟能詳反覆論述的始終是那些理論：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知識鴻溝(*knowledge gap*)、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認知共同適應(*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與鋪墊(*framing and priming*)、創新擴散(*diffusion and innovation*)……從傳播學老師、到一代代學生，時代的篇章已經翻新了好幾頁，理論卻停留在老師還是學生的那個年代，創新論述的貧瘠與反覆「炒冷飯」的

尷尬，迫切呼唤傳播研究誕生新的理論「彌賽亞」——它是否可以通過將智慧的明眸回轉到東方文明而產生？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整理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統攝性理論，搭建獨樹一幟的中華傳播學門，使之真正成為對中華傳播事件與傳播方式的思考聚焦、理論投射與文化溯源，與西方傳播學界產生獨立、平等的對話與交流，無疑為華人傳播研究之崛起須當致力的共同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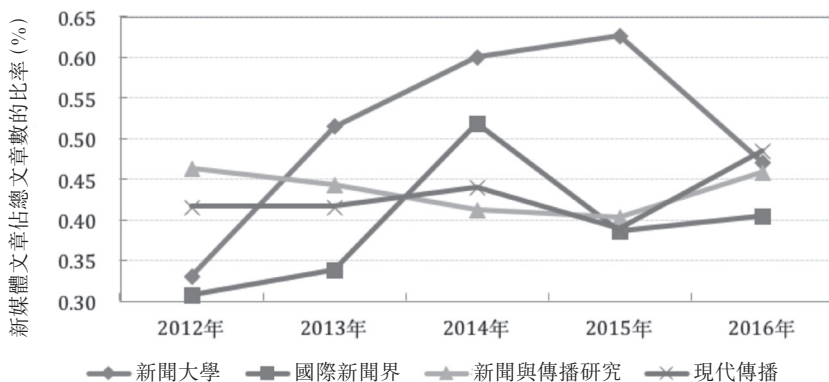
新媒體浪潮送「東風」

值得關注的是，華人地區新媒體浪潮的湧動與新媒體研究的熱象，為中華傳播研究「求本」之探索帶來嶄新的機遇。網絡的影響力加速時代的變革（張國良，2016），互聯網、智能手機、大數據的興起，打破新聞傳播研究的傳統學域與權力架構，溝通主體、溝通內容與溝通平台的劇變，對華人傳播學研究產生了實質性與正面的影響（陳懷林，2012）。³ 從近年來各大中華新聞傳播學刊刊載文章的研究方向，便可一睹中華新聞傳播學界對新媒體事件的敏感與重視。例如《傳播與社會學刊》早於2009年第9期推出「新媒體事件」專刊，集中對新媒體與媒介事件研究的新方向展開討論，提出「『新媒體事件』是什麼？為什麼值得研究？其學術淵源為何？在今日的中港台三地，它有怎樣的社會意義？在今天的傳播研究中，它帶出怎樣的觀念及方法問題？我們作為研究者，應當如何應對這一新的挑戰，並藉此提升華人傳播研究，乃至傳播與歷史研究的總體水平？」（馬偉傑、陳韜文、黃煜、蕭小穗、馮應謙，2009）等思考問題，並將學刊的「新媒體之思」發揚至今。以最近一期《傳播與社會學刊》（2016年第37期）刊登的學術論文為例，以新媒體為研究論述對象的刊文佔據論文總數的「半壁江山」。⁴ 台灣地區的新媒體傳播研究同樣升溫。據台灣《中華傳播學刊》主編楊意菁教授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自2002年《中華傳播學刊》創刊至2005年底，該刊刊載的論文以「傳播理論」主題為最多（25.7%），「新媒體」主題最少（4.1%）；2006—2010年之間，「傳播產業與政策」相關主題的論文較多（23.3%），「公關廣告」主題較少（9.3%）；但到2011年以後，「新媒體傳播」轉而一躍成為最多論文的主題（24.7%），原先數量獨佔鰲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的「傳播理論」主題則跌落谷底(8.2%)。相比港、台及海外華人傳播學者，大陸新聞傳播研究者對新媒體事件的關注有過之而無不及(邱林川, 2016)，僅就當日與會學刊、大陸CSSCI新聞傳播綜合雜誌排名中穩居前四的《國際新聞界》、《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與《現代傳播》學刊刊登的新媒體研究論文數量而言，分別以「網絡」、「新媒體」、「移動互聯網」、「微博」、「微信」為關鍵詞進行學刊文章主題檢索，發現從2012年至本文截稿(2016年12月)時，CNKI中國學術文獻網絡出版總庫中四刊圍繞新媒體展開研究的論文數分別為264篇、377篇、293篇、425篇，分佔五年同刊論文發表總數的43.27%、36.89%、50.90%、42.61%，並且，如圖一所示，五年中除《新聞與傳播研究》學刊新媒體論文佔同年論文總數比率增幅基本持平外，其餘三大學刊中的新媒體研究文章數量比例呈現總體上升趨勢。

圖一 大陸四家新聞傳播學刊(2012-2016)新媒體研究文章佔刊文總數的比率增長



新媒體技術的「東風」，使得兩岸三地華人傳播學者紛紛聚焦新媒體事件展開研究。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以新媒體情境下的傳播個體為研究出發點，將之作為社會構成之基本元素與基本動力，從新聞傳播的研究視角、方法與理論出發來展開更為貼近時代、貼近本土與貼近「人」的社會前沿研究，促使了媒體研究的轉型與創新；另一方面，熱鬧的新媒體研究形勢，卻依然掩蓋不了其背後的學術困境：一

是理論性弱 (atheoretical)，二是缺乏歷史感 (ahistorical)，三是缺乏脈絡 (context-free) (魏然，2015)。究其根本，還是研究缺乏宏大的研究視野與深刻的文化根基。因此，我們面臨的新媒體研究勢態，無疑可借力成為當下建構「中華傳播學」的一大契機。

借「東風」、闢蹊徑、建學門

那麼，如何借「東風」、闢蹊徑，撥雲見日以將研究重心從「向外」轉為「向內」、進一步轉移至因應華人社會的本土需求、量身打造契合中華文化的原創理論上來呢？與會主編與學者們的熱烈發言，大致可明晰為三條可行的路徑：

其一，「回到過去」。就治學本身而言，「歷史上向前一步的進展，往往是伴著向後一步的探本窮源」。⁵ 試問：若無根深，何來葉茂？因此，「回到過去」，並非學術倒退、固步自封，而是恰合當下新媒體變革下的「融合」趨勢，從傳播研究的學術視角展開對歷史、對文化的思考、提煉與融合。《新聞與傳播研究》主編唐緒軍教授提出，過往的華人傳播研究，往往容易陷入「媒介中心論」的思維定勢，圍繞媒體做文章。然而，若是換個角度，從「跨學科傳播研究」的視角出發，將不同的研究視角與學術路徑融入到傳播事件的分析中，譬如從中國社會語境下的文化根源視角出發，或許會得出比單純從媒介視角觀察來得更為深刻的理論結論與理論建樹。事實上，迄今已有華人傳播學者，將研究的目光回溯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深入到中華哲學文化的本源，探討傳統文化、禮儀、規則對華人傳播行為的規約、效應與影響。1988年學者吳予敏出版《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便是大陸第一本探討中華傳播文化的專著。之後陸續有中華傳播文化的相關研究論著產生，例如學者Chang & Holt (1991) 對華人人際關係中「緣」的涵義、效用與意義之探討；Chen & Chung (1994) 關乎儒家思想之於中華組織傳播中關係影響的研究。台灣學者朱瑞玲、章英華 (2001) 從傳統中國家庭禮儀倫理的角度探討家庭溝通的文化與變遷；而學者Chen (2001) 則從「和諧」這個核心價值概念出發，勾畫出華人溝通行為的經絡場域，以「禮」、「義」、「仁」三個概念為經，「時」、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位」、「幾」三個概念為緯，並由「關係」、「面子」與權威三個概念相輔相成，作為影響溝通中經緯元素互動時的主要元素。一套異於西方、適用於華人社會的本土性溝通理論，由是產生，初具模型。2004年台灣學者陳國明主持編輯了《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從中華文化的角度出發，集中探討了中華的傳播型態與行為。這部華人社會首見的中華傳播理論合輯，收錄了當時一批優秀的中華傳播學研究論著，包括學者馬成龍對「關係」與華人溝通行為的探討；蕭小穗從「禮」出發對華人溝通行為進行的分析；黃國光對華人溝通行動中「臉」與「面」關係的闡述；鍾振昇探討華人傳播理論中「氣」的涵義；⁶等等，為建構中華新聞傳播學理論之路提供了頗應鼓勵的方向。近年來，大陸亦有學者關注中華傳播文化，但較多著眼於文化的國際傳播，缺乏具體社會情境的「深描式」、系統性的研究。因此，此類「退步原來是向前」、從傳統文化視角融合當代傳播事件分析的研究之舉，縱然在大量華人傳播學研究成果中有如滄海一粟，缺乏相當的學術氣候，但若華人學術共同體共同努力，加之中華傳播學刊的主題建構與推動，固然有希望形成一套原創性的中華傳播知識理論話語，問道於獨立、自主的學術領域地位。

其二，是「存同求異」。即通過對不同地區傳播文化、理論、研究成果與具體傳播事件的比較性研究，跳出「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思維設限，以更好地認識他者，建樹自己。「回溯」是「求本」，比較亦是「求本」的做法——本著開放的文化自信、而非封閉的文化自戀對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學研究成果作充分、系統、互動的瞭解與分析，然後加以剔除、選擇、吸收、改進，做到博採眾長，為我所用；本著探索歧異之根源與性質的學術目標，對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地區等學術意義上的「他者」進行比較，亦更有助於發現當下傳播事件背後的「自我」社會文化結構，由此產生新的理論創新源頭。例如2005年周永明的《中國網絡政治的歷史考察——電報、網絡與中國的政治參與》(*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把晚清民初通過電報開展的政治傳播與21世紀初的互聯網公眾討論勾聯起來，使大家對新媒體事件研究有了新的想象與認識(Zhou, 2005)。此外學者楊國斌(2016)亦

將文革時期與新媒體社會下的政治動員運動進行比較研究，探討中國社會政治動員的文化共性。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比較，如果運用恰當，可以是最有效的學術生產手段，因為它讓我們更好地超越現象，發現事件背後的文化結構和歷史規律，從而在華人傳播現象與新媒體事件的交集中建立貼近社會現實、同時又更具邏輯分析層次的分類體系，以此作為中華傳播學界能夠與全球學界對話的起點之一(邱林川，2016)。

其三，則是「著眼當下」，從當下實際出發，帶著華人傳播研究的問題意識去研究。新媒體時代事件層出不窮，能否對具體事件進行研究，進行理論探索，成為各大學刊編輯看重的扼要。《國際新聞界》主編劉海龍教授提出，無論是研究「新」媒體還是「舊」媒體，是否具有華人傳播研究的問題意識、是否能夠切中現實的和理論的重大問題、是否具有理論上的創新性貢獻是該刊理念中好的研究文章的標準；《新聞與傳播研究》主編唐緒軍教授亦強調新聞傳播研究成果對其他新聞傳播研究者與從業者、及中華傳播實務的啟發性。《亞洲傳播學報》主編郝曉鳴教授介紹該刊選稿標準，即是以實證研究為主。他認為提出一番道理固然有益，但在對過往研究文獻的比較性學術回顧的基礎上，進行貼合實際的社會調研更為重要。《現代傳播》主編胡智鋒教授表示，完全套用西方現有理論來解釋目前社會現象的論文並非可取，對現有傳播理論建樹有所貢獻、對當下新聞傳播研究的熱點與趨勢予以積極呈現與深度挖掘的研究文章，方是該刊鼓勵的方向。《傳播研究與實踐》編委林富美教授則介紹，為鼓勵學者研究聯繫當下，當社會出現不同熱點議題時，學刊會通過策劃緊扣現實的學術專題，將學術研究和社會脈動緊密相聯，廣泛邀稿，以此鼓勵更多的傳播學者投入本土性與多視角的傳播學術研究中。可以說，主編們對研究聯繫實際的重視，對打造「中華傳播學門」的生命力而言至為重要。「理論是灰色的，而學術之樹長青」。我們講求追本溯源，向歷史中去，但目的是要把學術之根扎深，更好地研究現實，服務現實，改造現實，這才是我們研究學術、建構「學門」的根本意義。

綜上所述，新媒體研究的熱潮給華人新聞傳播學的理论建構帶來新的發展契機，若能乘勢而動，從「回到過去」、「存同求異」⁷與「著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當下」的角度出發，橫向參照西方傳播學的經典理論與方法、縱向承接中華傳統文化與思想，展開對華人社會的傳播事件研究，建構起一套能夠貼切闡釋華人傳播事件的模式與理論，成為中華傳播學刊主編們組稿擇稿的重要標準，也是推動這一學科真正成為社會科學研究最前沿的建設性路徑。

「倚何處立」：信息平台 求「共」求「新」

新媒體時代降臨二十多年來，帶給中華新聞傳播學與學刊的，不僅體現在研究內容的變化上，更旗幟鮮明地體現在了知識傳播載體——學刊信息平台的形式變通上。

無庸置疑，傳播力是至為重要的權力。如果說學術期刊的傳播力可以進一步細分的話，學刊內容的傳播力、內容打造出的學刊「聲譽」的傳播力，及學刊本身平台的傳播力大體分構成其權力的三種層面。傳統學刊以紙張與機械印刷複製技術為核心、借助定期的刊物出版、發行與流通完成，其所承載的傳播內容的有限性、傳播時間的定期性、傳播對象的穩定性與傳播效果的相對確定性特徵，往往在時空層面限制了學刊的傳播力的彰顯。新媒體的到來則意味著對傳統學刊權力的巨大衝擊。當我們步入「零邊際成本」社會 (Rifkin, 2014)，⁸ 學術信息來源多樣化、網絡知識共享化與線上線下互動化的知識傳播模式不斷撼動傳統媒體的權力壟斷地位時，層出不窮的新媒體技術早已將原本有限的期刊內容「無限化」、定期的傳播時間「靈活化」、穩定的傳播對象「多元化」及相對確定的傳播效果「未知化」了。換言之，脫離傳統知識生產與流通的時空限制，信息的傳播無疑插上「自由」的雙翅，使「開放」、「共享」與「協作」成為當前學刊發展理念的關鍵詞，這無疑對學刊作為媒體平台的傳播力提出了更為嚴峻與迫切的要求。因應新媒體的「東風」，變革傳統媒體傳播路徑的運作思路與發展邏輯，將互聯網思維投入到當前中華傳播學刊的平台運行與擴展中，方能在新媒體時代延展期刊的「第三種權力」，孕育出學術傳播更為蓬勃生機的廣闊氣象。

新媒體平台、引領轉型、共享信息

令人稱道的是，在傳統期刊數字轉型過程中，新聞傳播學刊憑藉對「春江水暖」的專業及敏銳感知，在新媒體的平台遷徙道路上展現出引領之姿。僅以與會學刊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自創刊首日，就施行了紙本與電子版同步發行的傳播模式，並將所有期次全數以電子檔形式在網站上開放。台灣政治大學發行的《新聞學研究》，以及2015年媒體改造學社創辦的《傳播、文化與政治》，均採用了這種紙質版與電子版同步發行的模式(馮建三，2016)。有的學刊甚至在紙版尚未問世之前，便先行主動將電子版通過電郵寄給訂閱者，或用社交媒體對外廣而告之。據《國際新聞界》主編劉海龍介紹，該刊所創建的微信公眾號平台，目前已擁有2萬多的訂閱用戶。新媒體平台上日漸活躍的各大學刊身影，顯現出中華新聞傳播學刊運用新媒體平台增擴用戶量及影響力的努力。

隨信息自由流通而來的，是學術資源的共享。「中華傳播學門」並非一日建成，而是需要行政、學術機構、媒體、學者等各方元素的協作努力。而資源的共享與各地華人學者突破地域藩籬、加強學術互動成為促進學門建構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副主編蘇鑰機教授提議，為促進全球華人傳播學者的溝通與合作，可搭建一個「全球中華傳播學刊聯盟公共平台」，以中華傳播學的核心理論與研究個案為聚焦，由各大與會學刊將其每期最新文章目錄與摘要上傳至此，以利學者們更方便快捷地了解當前中華新聞傳播研究的最新成果與趨勢，也便於對不同地區傳播學刊的定位與發展進行對比分析。《新聞學研究》主編馮建三教授則呼籲，兩岸三地華人新聞傳播學刊可採用數字化技術，通過刊物的出版機構合作並廣邀其他中文傳播學刊一起加入，聯合製作中文傳播期刊資料庫，擴大本身研究成果得以自由流通的深廣範圍，努力使這一起自傳播學術期刊的數據資料庫能夠圍繞共同的學術旨趣與目標，一起探索、傳播與分享新聞傳播學術知識，打破學術的傳統權力壟斷，真正落實新媒體時代下學術知識自由「流通」的宏願。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當然，來勢洶洶的新媒體浪潮有如「大浪淘沙」，優質的傳統傳播學刊在新的媒介情境下依然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與知識權力。如《國際新聞界》主編劉海龍便認為，網絡化的學術傳播是現有學術發表體制的一個重要補充，但並不能完全替代中華共同體內部的大眾傳播研究。理由首先在於優質傳統學刊內容的權威性。自媒體的發佈和網絡化傳播缺乏把關、及客觀統一標準的評審，學刊則提供了這種可靠權威的內容保證；二是優質傳統學刊平台的關注度。這種關注度，是由學刊內容及學刊聲譽日復一日打造出來的，它本身便可給一些新晉作者帶來超越自媒體與新媒體平台的關注；其三，則緣於體制的的原因，特別對於大陸高校學者而言，其晉升、課題結項等成果與學術發文緊密連結，學刊因此而成為相關學術學力認證的必要權威平台；最後，由於平台大、資源廣，傳統新聞傳播學刊往往選題發文內容相對綜合，更有利於打破不同學科研究者之間「畫地為牢」的狀況，促進學術靈感火花的生成……儘管如此，各位主編一致認同，固有的價值與權力，並不應成為學刊同仁固步自封的依據；相反，若是因整體創新動力的不足及創新能力的有限，導致平台傳播力的權力缺失，那麼儘管有傳統學刊精心錘鍊打造的內容，卻難保不會出現其他新媒體「黑馬」捷足先登、率先、廣泛、互動式地傳播知識內容，形成縱是優質傳統學刊，亦會面臨影響力日漸邊緣化的可能性。因此，要使學刊的傳播力在未來社會不斷增強，需要內容、聲譽與平台三個層面協作一致、共同努力，在維護學術內容的獨立性與可靠性的同時，充分利用新媒體平台的影響力，尋找「互聯網+」、「微信+」等新的傳播載體形式來提高閱讀量，提升知名度，使傳統傳播學刊的綜合傳播力通過新媒體平台得以承載、延續與增強。

「以何為本」：人文理性 求「真」求「深」

互聯網時代，新媒體作為知識傳播的「雙刃劍」，它帶來海量的信息，給人便利，也使人迷失。當知識、言說與理論在新媒體傳播模式下變得符號化、簡單化與碎片化的同時，人們的學習與思維模式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換言之，那些過往對生活、事件和知識的集中性、

批判性的思考模式被噴薄而出的信息改變，現在的人們往往習慣於對一個信息點驚鴻一瞥之後，便匆匆迎面向下一個信息點的感知刺激。「囫圇吞棗」、「速食主義」給社會人文學科建設帶來的，是對研究本身原創力、持續性與體系性的損傷；對速度的追求與利益的謀求亦使得治學的動機產生扭曲，理性精神漸消，對話機制缺失，新聞傳播學刊作為社會研究學術公器亦處於不斷褪色的境地（劉書亮、黃心淵，2016）。或許「這是智慧的時代，亦是愚蠢的時代」之狄更斯名句適用於任何一個年份，但新媒體時代給予我們的信息自由，尤其考驗我們的用心、專心與「本心」，唯有不忘「以人為本」的人文學術精神，發掘真實、深入肌理、崇尚真理、才能在新媒體大潮下牢牢把握治學的核心。

「以人為本」：探索人性、關懷人心、服務人才

「以人為本」，首先是學術研究中始終應保持的人文關懷——任何社會學科，包括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人文藝術學科等在內，其研究的重點都是實實在在的人（Page & Connell, 2012），對傳播事件中的人性的探索、對傳播過程中的情感動員與文化抵抗、情感捲入與同情的觀察研究，都具有強烈的本土人文特點，這些本土性特點，運用西方傳播學研究理論與框架或許難以深入肌理，以至陷入「隔靴搔癢」的尷尬境地；加之互聯網絡對傳播過程中個人權力、個人能量及個人資源的激活，使得「人受制於物的歷史將要結束，人本時代將要到來」（朱光烈，2016），以個體為出發點來理解現實世界、看待個體權力被激活後的新的社會構造和傳播樣態更應成為中華新聞傳播學域努力進取的方向。只有堅持「以人為本」，從新媒體事件的持續觀察中去感受、去理解、去發掘人性的真實與社會的多維，才能抽絲剝繭出隱藏在媒體事件背後的內在華人社會傳播邏輯，也才能真正深入做到研究「去偽存真」、對策「因地制宜」。

「以人為本」的第二層含義，則是針對中華傳播學(刊)而言，以服務研究撰稿人為本。就媒介本質而言，學刊是人類信息和知識的生產、組織與傳播的方式，定期出版、專家評審與表述準確（不容隨意更改）是傳統學刊內容生產的主要特徵（馮建三，2016）。在數字媒體的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動下，學刊內容的傳播固然可以憑藉當下的極致傳播力解決知識「自由」流通的效率問題，但知識的生產卻永遠是學術交流與學門建構之源。而人類社會作為一個依靠觀念運行的複雜生態系統，決定了它的發展將永遠伴隨著對知識的需求與人類社會改善的渴求。從這一層面講，紙質學刊作為一種傳統社會的知識傳播與交流媒介形式，在新媒體時代或許面臨被取代的危機；但它作為一種知識生產的方式，卻具有象徵層面上的永恆意義——它既能夠在工業文明時期點燃文化啟蒙火花，也在當下與未來托舉著人類社會進步的責任火炬。明瞭學刊的這一承載人類「知識生產」的本質，對於學刊在新媒體時代的轉型與發展，無論從技術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上都十分重要。

因此，作為知識生產的一種方式，優質的學術論文始終是傳播學刊的核心競爭力，事變時移，不變的卻永遠是對高質量論文的渴求。換言之，學刊的任務，除「為新聞傳播社群成員提供高質量之學術論文，促成開放及多元之討論，藉以形成相關領域研究者對『何謂媒體與傳播』之共識」外，還應起到服務學術共同體、促進優質論文孵化成形的作用。這必然涉及到如何吸引、聚集與培養優秀供稿學者的問題。對此，《新聞大學》主編張濤甫教授提議，與會各學刊負責人可挑選、集合每年期刊的若干優秀稿件，送專家匿名評審，選出最能代表當年傳播學研究趨勢與水準的優秀論文進行嘉獎與鼓勵，以此作為華人傳播學者進步發展的一大推動力。馮建三教授(2016)則認為，利用新媒體技術擴大來稿刊登量，對於吸引研究人才頗為有利，體現為：一是對撰稿人的激勵。因為刊行機會上漲，撰稿人撰寫動力勢將增強。目前各個與會學刊的每期退稿率，少則50%，多則達80%以上，居高不下的篩選比例或使人望而卻步，裹足不前；倘使有轉載的保證——即便是對投稿文章分門別類的刊登，亦多少有助於減少這種「畏難」的投稿人心理狀態，調動整個學界研究者的投稿積極性。二是對「野有遺賢」的缺憾的彌補。在馮教授看來，歷經時光篩選而知名並具有洞見的論文，最初卻應有不少被學刊拒絕的例子，利用新媒體轉型增加見稿率的做法則會極大減少這種缺失，將研究成果交由時間來裁定。三是對於作者與審查人及學刊之間或許存在的意見衝突，特別是作者認為

新媒體時代中華新聞傳播學(刊)的發展前景與格局

刊物不公允的怨懟，可望因為公開而有較多的公評而因此減少。最後，審查意見(匿名或具名可以另作設計)的完全公開，具有很強的指導與參考意義，對於學術知識的交流及研究者的學習或能起到更好的作用，並進一步推動中華傳播學門的孵化與建立。因此，儘管這種利用新媒體平台增加刊稿量的構想，在操作邏輯上或許會存在作者濫用該模式的可能性，從而導致稿量的增加和編輯工作難度的加大，但馮教授認為，若有配套措施並行，則可以從根本上真正秉承「君子善假於物」的精神，充分利用數字科技吸引、留住與栽培傳播學研究人才，將學者凝聚到學刊平台的周圍，從而真正實現社會(知識)制度與(傳播)科技的結合，建成對研究學者而言更為和善的學術環境與效應。

結語

學術期刊的繁榮是學術繁榮的重要標誌。二者之間良性互動，互相促進。如今，中華傳播學期刊正自覺不自覺地形成聯合，在兩岸三地華人學術圈中共同扮演帶領學術研究風潮、社會脈動討論，甚至是影響傳播實務的角色，對新媒體時代中華傳播學研究的建構與發展，負有榮損與共、義不容辭的責任。於與會學刊編輯而言，重視新媒體的內容研究並非匍匐於信息傳播技術腳下，擴展新媒體平台也並非調轉手中的「舵盤」，而是共同立足於中華傳播研究之實際、找尋中華傳播學的核心理論，保持對中華傳媒生態獨立的學術審視態度與「以人為本」的人文理性批判精神，從而形成立足本土文化的中華傳播理論和傳播實踐，進一步發揮華人傳播學對學術、社會以及人類實踐的影響。只要牢牢把握中華傳播學刊應「向何處去」、「倚何處立」與「以何為本」的原則與初心，透過學者、學刊的不懈努力，要發展出獨立有創見、權威有建樹的中華傳播學應該不是紙上空談。我們有理由期待，傳播學界的下一個「彌賽亞」能夠於新媒體時代下的東方文明處冉冉升起！

註釋

- 1 問題包括：
 - (1) 您負責的期刊之投稿量及接受率為何？
 - (2) 您負責的期刊有哪些選稿原則？編輯優先考慮什麼稿件？如何進行論文評審？
 - (3) 您負責的期刊怎樣進行專題安排？
 - (4) 您負責的期刊來自不同地域作者的情況如何？
 - (5) 您負責的期刊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如：稿件水準、邀請評審委員等。
 - (6) 當前華文傳播學刊面對的主要問題與挑戰是什麼？
 - (7) CSSCI、TSSCI及SSCI對華文傳播學刊的影響？
 - (8) 目前傳播研究是否有某些新趨勢？這些趨勢有什麼特點？學刊在傳播研究趨勢的興衰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 (9) 在數字媒體時代，知識生產與學術傳播日益網絡化，學刊的形式與出版的正當性是否正在轉變？
- 2 如各個學刊每期的投稿情況、審稿機制、稿件接受率、專題安排等。
- 3 學者陳懷林(2012)依據對大中華地區的6本具有代表性的傳播學學術期刊1995至2010年發表的1,200多篇論文的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學術規範和引用文獻等的項目分析，得出新媒體的發展已經對該地區、尤其是中國大陸地區的傳播學研究帶來了實質性與正面影響的結論。影響包括：就大中華地區的傳播學研究而言，新媒體的研究成為僅次於大眾傳播的最重要的研究領域；採用內容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比例穩步上升。此外，新媒體極大方便了大陸學者接觸國際學術成果和學術規範，並導致內地傳播學研究的相應變化，如思辨研究方法的式微、學術規範逐漸同國際接軌、引用參考文獻的數量增加以及參考文獻來源的多元化等。
- 4 分別是《日漸網絡化的個人與社會》(張國良)、《網絡個人主義——網絡社會的溝通之道》(對談人：巴里·威爾曼、邱林川、張人文、甘晨)、《台灣民眾網絡素養調查：網絡素養、網絡經驗及生活滿意度關係之綜合探討》(林淑芳)及《中國社交媒體網絡營銷中的用戶勞動和消費主義主體建構：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帳號為例》(黃炎寧)。
- 5 取自魯迅在書信《致魏猛克》中的話。參見人民文學出版社(編)(2005)，《魯迅全集(第十三卷)》(頁7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6 大陸學者應星亦將中國傳統倫理中「氣」的情感文化概念運用到中國社會運動的研究中，探討農民與基層政府的政治溝過程，進一步擴大了傳統

新媒體時代中華新聞傳播學(刊)的發展前景與格局

- 文化概念在政治傳播中的運用。參見應星(2007)，〈「氣」與中國鄉村集體行動的再生產〉，《開放時代》，第6期，頁106-120。
- 7 在台灣學者汪琪看來，「存同求異」的同時也應「存異求同」，努力將中華傳播事件中包括「和諧」、「關係」、「面子」、「緣分」等在內的獨特文化價值與因素，找到理論化及其與國際對話的途徑，以同時兼顧本土的「特殊」與理論論辯所需的「普世」。參見汪琪、蕭小穗(2014)，〈本土研究的下一步〉，《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9期，頁1-15。
- 8 學者Rifkin提出「零邊際成本」社會的概念，認為未來社會的主要經濟模式將是協同分享模式，在這樣的經濟模式下，諸多經濟活動的邊際成本都接近零，出版產業的寡頭壟斷地位和運營模式將被顛覆。參見Jeremy Rifkin(2014),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巴里·威爾曼、邱林川(2016)。〈「網絡個人主義」——網絡社會的溝通之道〉。《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7期，頁1-23。
- Bali Weierman, Qiu Linchuan (2016). Wangluo geren zhuyi—Wangluo shehui de goutong zhi dao.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7, 1-23.
- 方漢奇(1999)。《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 Fang Hanqi (1999). *Zhongguo xinwen shiye tongshi (diyijuan)*. Beijing: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朱瑞玲、章英華(2001)。〈華人社會的家庭倫理與家人互動：文化及社會的變遷效果〉。《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華人家庭資料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Zhu Ruiling, Zhang Yinghua (2001). Huaren shehui de jiating lunli yu jieren hudong: Wenhua ji shehui de bianqian xiaoguo.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huaren jiating ziliaoku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gji yanjiusuo, Guokehui shehui kexue yanjiu zhongxin.
- 汪琪、沈清松、羅文輝(2002)。〈華人傳播理論：從頭打造或逐步融合？〉。《新聞學研究》，第70期，頁1-15。
- Wang Qi, Shen Qingsong, Luo Wenhui (2002). Huaren chuanbo lilun: cong toudao dazao huo zhubu ronghe? *Xinwenxue yanjiu*, 70, 1-1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 汪琪、蕭小穗(2014)。〈本土研究的下一步〉。《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9期，頁1-15。
- Wang Qi, Xiao Xiaosui (2014). Bentu yanjiu de xiayibu.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9, 1-15.
- 李金銓(2014)。〈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一些個人的初步思考〉。《傳播研究與實踐》，2014年第4期，頁1-21。
- Li Jinqun (2014). Chuanbo yanjiu de dianfan yu renting: yixie geren de chubu sikao. *Chuanbo yanjiu yu shijian*, 2014(4), 1-21.
- 吳予敏(1988)。《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 Wu Yumin (1988). *Wuxing de wangluo—Cong chuanboxue de jiaodu kan zhongguo de chuantong wenhua*. Beijing: Guoji wenhua chuban gongsi.
- 邱林川、苗偉山(2016年)。〈反思新媒體事件研究：邱林川教授訪談錄〉。《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7期，頁11-23。
- Qiu Linchuan, Miao Weishan (2016). Fansi xinmeiti shijian yanjiu: Qiu Linchuan jiaoshou fangtanlu. *Guoji xinwenjie*, 2016(7), 11-23.
- 祝建華(2008)。〈中文傳播研究之理論化與本土化：以受眾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論為例〉。《新聞學研究》，2008年第68期，頁13-27。
- Zhu Jianhua (2008). Zhongwen chuanbo yanjiu zhi lilunhua yu bentuhua: yi shouzhong ji meijie xiaoguo de zhenghe lilun weili. *Xinwenxue yanjiu*, 2008(68), 13-27.
- 馬偉傑、陳韜文、黃煜、蕭小穗、馮應謙(2009)。〈新媒體與媒介事件研究新方向〉。《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年第9期，頁1-9。
- Ma Jiewei, Chen Taowen, Huang Yu, Xiao Xiaosui, Feng Yingqian (2009). Xinmeiti yu meijie shijian yanjiu xinfangxiang.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009(9), 1-9.
- 陳光興(1998)。《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台北：原尊文化。
- Chen Guangxing (1998). *Wenhua yanjiu: Huoer fangtanlu*. Taipei: Yuanzun wenhua.
- 陳力丹(2005)。〈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上網日期：2006年4月，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00/28502/28503/3955362.html>。
- Chen Lidan (2005). *Zhongguo chuanboxue yanjiu de lishi yu xianzhuang*. Shangwang riqi: April, 2006. Retrieved from: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00/28502/28503/3955362.html>.
- 陳國明(編)(2004)。《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台北：五南。
- Chen Guoming bian (2004). *Zhonghua chuanbo lilun yu yuanze*. Taipei: Wunan.

新媒體時代中華新聞傳播學(刊)的發展前景與格局

- 陳國明(2007)。〈中華傳播學向何處去〉。《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期，頁157-174。
- Chen Guoming (2007). Zhonghua chuanboxue xiang hechu qu.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 157-174.
- 陳韜文(2008)。〈中國傳播研究的發展困局：為什麼和怎麼辦〉。《新聞大學》，2008年第1期，頁3-10。
- Chen Taowen (2008). Zhongguo chuanbo yanjiu de fazhan kunju: Weishenme he zenmeban. *Xinwen daxue*, 2008(1), 3-10.
- 陳懷林(2012)。〈淺析新媒體對大中華地區尤其是中國大陸地區傳播學研究的影響〉。《文化與傳播》，2012年2月，頁21-26。
- Chen Huailin (2012). Qianxi xinmeiti dui dazhonghua diqu youqi shi zhongguo dalu diqu chuanboxue yanjiu de yingxiang. *Wenhua yu chuanbo*, 2012(2), 21-26.
- 張國良(2016)。〈日漸網絡化的個人與社會〉。《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7期，頁v-viii。
- Zhang Guoliang (2016). Rijian wangluohua de geren yu shehui.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7, v-viii.
- 張健康(2003)。〈論中國大陸傳播學從引進、發展與創新〉。上網日期：2006年4月5日。取自傳播學論壇網：<http://ruanzixiao.diy.myrice.com/lzgdclbxdyjfyzyx.htm>。
- Zhang Jiankang (2003). Lun zhongguo dalu chuanboxue cong yinjin, fazhan yu chuangxin. Shangwang riqi: April 6, 2006. Retrieved from Chuangboxue luntan wang: <http://ruanzixiao.diy.myrice.com/lzgdclbxdyjfyzyx.htm>.
- 馮建三、吳岱芸(2016)。〈論中文傳播學刊的後來居上：促進學術自由，善用科技〉。《新聞學研究》，第129期，頁i-xviii。
- Feng Jiansan, Wu Daiyun (2016). Lun zhongwen chuanbo xuekan de houlaishang: cujin xueshu ziyou, shanyong keji. *Xinwenxue yanjiu*, 129, i-xviii.
- 劉楓(2010)。〈傳播研究中的「中心理論貧乏現象」分析〉。《新聞界》，2010年第2期，頁14-16。
- Liu feng (2010). Chuanbo yanjiu zhong de zhonxin lilun pinfa xianxiang fenxi. *Xinwenjie*, 2010(2), 14-16.
- 劉書亮、黃心淵(2016)。〈新媒體時代的人文精神危機〉。《現代傳播》，2016年第1期，頁33-41。
- Liu Shuliang, Huang Xinyuan (2016). Xinmeiti shidai de renwen jingshen weiji. *Xiandai chuanbo*, 2016(1), 33-4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魏然(2015)。〈新媒體研究的困境與未來發展方向〉。《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1期，頁221–240。

Wei Ran (2015). Xinmeiti yanjiu de kunjing yu weilai fazhan fangxiang.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1, 221–240.

應星(2007)。〈「氣」與中國鄉村集體行動的再生產〉。《開放時代》，2007年第6期，頁106–120。

Ying Xing (2007). Qi yu zhongguo xiangcun jiti xingdong de zaishengchan. *Kaifang shidai*, (2007)6, 106–120.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Chang, H. C., & Holt, G. R. (1991). The concept of Yuan and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 Ting-Toomey & F. Korzenny (Eds.), *Cross-cultur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p. 28–51). Newbury Park: CAL Sage.

Chen, G. M., & Chung, J. (1994).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2, 93–105.

Delia, J. G. (198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20–98). Beverly Hills, CA: Sage.

Jeremy Rifkin (2014).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Lee, S. N. (2005). The challenges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Asia.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27(2), 189–201.

Leung, K., Chu, L., & Lee, P. (2006).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K. Leung, J. Kenny, & P. Lee (Eds.),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p. 189–209). Cresskill, NJ: Hampton.

Sadison A. (1967). *The wheel of empir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 in som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Wang, S. (2006).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In K. Leung, J. Kenny, & P. Lee (Eds.),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p. 159–176). Cresskill, NJ: Hampton.

Wu, T. (2006).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K. Leung, J. Kenny, & P. Lee (Eds.),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p. 133–157). Cresskill, NJ: Hampton.

Yang, G. B. (2016).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Zhou, Y. M. (2005).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新媒體時代中華新聞傳播學(刊)的發展前景與格局

本文引用格式

徐來、黃煜(2017)。「向何處去?」、「倚何處立?」與「以何為本?」:新媒體時代中華新聞傳播學(刊)的發展前景與格局。《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1期,頁251-275。